

【编者按】前不久中科院举办了“我心中的科学院”征文活动，吸引各界人士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促进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整体跨越发展。我所戴汝为、龙新华、张可文、胡包钢、彭思龙、范国梁等同志参与了此次征文。在投稿的文章中，既有建言未来发展的，也有回忆中科院优良传统的，收到良好的反响。本期和下期《天地》将转载部分征文，敬请广大读者留意。

中国科学院可否引领中国社会进步？

——以改变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为例

★ 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 胡包钢

近日读了《科学网》上“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中的许多文章，不仅为前辈的艰苦经历所感动，还对诸多文章中的真知灼见而共鸣。很多文章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科学院的真心挚爱和更多、更大的期许。从这些文章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前辈们曾是那样执着而淡定的走过，让我感悟到人生中最珍贵的不是权势与名利，而是奉献。读这些感人文章，犹如心灵得到净化。

这种开放式的征文方式让我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活力，它不仅会为中国科学院留存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有可能会成为科研体

制完善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我十分认同征文中许多作者的要点建议：

“中国科学院应该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火车头”。除了不断

培育国际水准的科技创新成果、为国家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之外，中国科学院还应该在科研体制和文化建设方面要有更大作为，创新发展国际一流并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管理体制。中国科学院有必要影响国家决策并引导社会共识：

“科研体制与文化建设的重于人才引进”（可以参照中国古代先哲的

“南橘北枳”之说）。基于此原理，本文中将以中国信息化发展为例，谈一下个人观点，说明中国科学院

可以从战略性的具体问题入手，开展富有本质成效（而非“放卫星”式）的工作，由此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实质性进步。

首先我们应该对中国信息化发展现状有个基本判断。可以认为在软件应用方面中国仍然严重的依赖于国外企业的产品。或者说中国信息化平台的基础是受制于他人的。该问题不仅是潜在地危害中国信息安全，更大的伤害还体现在教育环节上。考虑到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多数学校仍然无法应用正版微软产品开展教学。我们大量学生不得不在非法软件环境下完成计算机学习和应用任务，所谓国人“计

“**计算机软件 = 微软**”的观念大体由此方式培养形成。目前国内在校的大、中、小学学生有一亿多人。既然中国下二十年的发展要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小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在非法软件平台上教与学对学生诚信与人格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可以延缓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其次当今社会已经无法将信息技术应用与发展仅置于技术范畴之内了。信息技术不仅渗透到各个行业，它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已经日益凸现出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等多项重要特征。比如信息化发展还涉及了就业、公共安全、知识产权发展等其它国家重大战略问题。要推动社会进步，必须重视观念上的转变。我不妨借用《孙子兵法》的名句，加以改编：“**信息安全，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从知识产权发展角度考察，温家宝总理2004年在山东考察时就曾表述过深刻见解：“**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从信息化技术合法应用入手将是最好的方式引导国人新观念的建立：“**知识产权发展将为国家和企业赢得国际水准的竞争力**”。

中国社会进步更源自于人们观念上的转变。

最后在解决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问题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立合法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软件平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问题，同时需求技术层面的支撑。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基础工作，包括软件与硬件方面的工作积累。中国科学院可以联合政府其他部门，以及国内外企业，为改变中国软件应用与发展的现状格局，扮演更为主动而积极的角色。从2001年起我所在的中法实验室(LIAMA)采用“自下而上”方式与兄弟院校合作推动教育界应用合法软件，但是收效远未达到预期。这说明软件应用需求大环境，“自上而下”的战略发展是必须的。这并不意指政府机构要干涉经济活动，目标是为建立软件应用的良好生态环境铺路。作为公共领域的教育部门应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切入点。

中国社会进步可以反映在诸多方面，关键是要直面问题并积极解决。以信息化路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已经得到社会共识。而根本性改观会指向校园软件环境方面。包括2005年我的拙文《建立教育领域中软件应用与发展的良好

生态环境》曾得到路甬祥副委员长和陈至立委员写给中国教育部领导的批示支持。六年后现状如何自有国人可以评估。针对教育中的大问题，教育部门应该设定具体发展目标。为此不能不让我们回想起邓小平先生的魄力与功绩：一是果断决策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他的名句是：“**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二是对出国留学工作的批示：“**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邓小平先生通过这两个“具体”事件中的目标设定，“整体”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在第一个事件中，不惧政治风险而首先向邓小平先生“提出恢复高考的第一人”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管本建议是否合适（从职能机构的责任范围而言），但基本理念是：“中国科学院要有敢为人先的求真勇气和科学良策”。

初稿于2011年7月4日发表在“科学网”2011年“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家——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终稿完成于2011年9月5日。

（致谢我所何林与宋琪两位同志对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